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拒绝流行】警惕谣言美学

一个新闻学新锐学者说的一句话，特别精彩，大意如此：信息传播事业的专业基石是“真”，价值基石是“善”，哪个都不能缺。需要警惕的是“美”，因为审美化的信息内容往往隐藏着掺杂着各种类型的东西。——对“美”确实有这样的警惕，真善美的日常表达，不是随意排列，而是包含着一种先后的价值次序，“真”有着最高的位置，美处于末端，我在《时评写作十六讲》中再次重申了这个专业主义原则：一事当前，先问真假，再说是非，后说利害。审美中往往包含着利害。

最近就看到一则看起来挺“美”的传闻，说“陈薇院士先试疫苗第一针”，一张陈院士被注射药物的图片，说陈院士团队研制的疫苗已进入临床阶段，第一支新冠病毒疫苗，今天注射到陈薇院士左臂，专家组7人也一同注射。照片和配文在网络上流传，不过很快辟谣，疫苗的研发周期是很长的，陈院士注射的根本不是疫苗，而是前段时间出征武汉一线前在注射药物。此前媒体报道，各个疫苗研发团队都在夜以继日地争分夺秒，力争疫苗最快

【含英咀华】减压

“我们身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但我们都在一个天下一个地球。”日本赠送医护物品给我，装物品的箱子还贴上诗句，表达的是这样的心意。国人对其博爱之心，对其相当于“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无不感谢赞叹。表达上述心意的原文，是典雅的八个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本继续赠送物品时，还有其他类似的典雅表述。日本千多年前吸收唐代的优雅文化，而今仍然有其文明优雅的风范，真叫我们高兴。

加以比照，当前很多“公知”或“准公知”，则有这样的批判：国人只会喊“加油”，太浅陋了，太没有文化了。我这“公知”不能苟同。

一般公知大抵都知道现代传播学理论：信息如何传达，要视乎场合，视乎受众。电影《窈窕淑女》出身基层的卖花女，在语言学教授的近乎魔鬼式操练后，才能发出英王标准的几个音节；如果你向他朗诵莎士比亚的英语名句，或者阿瑟·韦利英译的《诗经·关雎》，由奥黛丽

【如是我问】最低限度的道德

1951年，刚回到法兰克福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出版了他的小书《最低限度的道德：对受损害生活的反思》。

2001年有一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后，一个德国学生送了我一本苏尔卡普出版社的简装本，这是为了纪念这本书出版半个世纪的纪念版，尽管很朴素，却很漂亮。

1934年阿多诺从纳粹德国逃往牛津，后于1938年到了新大陆的英国。最初他在纽约，其后到了德国国家“名流”聚集的洛杉矶，他的邻居中就有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

【横眉热对】掉书袋

大概在1980年年底吧，钱钟书到日本，做了一个著名的讲演，题目叫《诗可以怨》。

钱老洋洋洒洒，古今中外，引经据典，谈了一个由来已久的情感表达的问题，一字以概括之，“怨”也。他信口开河，东拉西扯，看似不经意，结尾处却慎重指出：“‘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

那个年代，年轻的大学生卢新华以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而启动了一场新的文学运动，其影响所及，各个艺术门类都卷入其中，包括美术在内。钱钟书以其聪颖明智，内心自然明白所出现的一切。不过，他仍然刻意保留其名士风范，拒绝所谓的“思想”包装，以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掉书袋”的方式，悄然加入到这场旨在催人泪下的情感表现主义加唯美浪漫主义的新时期艺术运动当中。

钱钟书“掉书袋”的功夫非寻常人可比，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也相当惊人。至少当年我翻阅四卷本的《管锥篇》时立马望洋兴叹。而且，我相信不少立志于文化工作的后进者们，也会产生如我一样的敬畏。反正，这一辈子再努力读书，肯定也掉不进如此浩瀚、涉及众多语言的“书袋”里头。

“诗可以怨”，古人深刻地了解这个浅显的道理，知道诗是“蚌病成珠”的产物，所以，如果没有真的痛苦，就不要“无病呻吟”。一旦有了痛苦而且真切，以情入诗，诗之感人也就自然如此如此这般了。说到底，一部文学史，说来说去，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理。

【不知不觉】汪曾祺家的打卤面

3月5日，是寂静的、沸腾的一天，朋友圈里读到各种纪念的文章。有关于汪曾祺先生的，他的百岁诞辰。

如果从书籍的出版来看，一个作家在人群中的冷暖的话，汪曾祺显然是热度较高的，有各种选本和全集。我在微信公众号里选了1991年第2期《收获》上汪曾祺的一篇自述文章《随遇而安》。那些年的《收获》上开辟了一个专栏“人生采访”，请大作家们“且说说我自己”，再请他们推荐一个人写印象记。于是有多篇就写了“且说说我自己”。而汪曾祺先生的，就是《随遇而安》，写他印象记的是韩蔚霞的《酒话》。

我是读了《受戒》才知道汪曾祺先生的。他晚年小说在《收获》上也刊发多篇，比如《小娘》。书架上也有很多汪曾祺先生的选本。读他的散文和小讲，看到讲述他人生的争议也略微看了一眼，往往是在散漫漫的状态，却忽然会怦然心动，那些感受不归纳，由此放置。也许下一次遭遇，不知是以何种方式。他



吕红 旅美华人作家

【彼岸听涛】作品存活的土壤

在我脑海的存储库里，除了作家的作品之外，还有其音乐家般的鲜活记忆。比如：严歌平严歌琴兄妹俩，一个大智若拙，一个秀外慧中；刘震云幽默下暗藏机锋；阎连科三分荒诞，七分真诚；王朔伶牙俐齿，冷眼毒舌；王安忆人生沧桑波诡云谲的睿智；王德威儒雅潇洒中深刻敏锐的洞察力；还有那“等你，在雨中”的余光中，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的王鼎钧，更有那像西北黄土一般深沉凝重的陈忠实……

当年遇见陈忠实，清瘦峻峭，满脸皱纹，一种内敛沧桑的神色像黄土一般深沉凝重。

西北汉子的质朴，全在一口方言里。啃着馒头将自己封闭在偏僻山沟四五年，捧出大部头磅礴、颇具史诗诗意的《白鹿原》，被称为“死后能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的书，将读者眼光拉向大西北那片饱含苦难和历史文化底蕴的土地。

一个作家创作多种文体，这往往是一种需要，更是一种互补。作者对自然、对社会现象的思索，对艺术实验的探索，为读者打开一扇扇窗户。作家每一天都应是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创作始终应以厚重的生命体验与思索为主线贯穿其中，别具匠心。

陈忠实认为《白鹿原》是在一个高度上体现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艺术表达。读者的认可对于作家来说也是最好的心灵慰藉。“读者是作品存活的土壤。”

【昙花的话】蝙蝠的家

经过整整8个小时的舟车劳顿，来到了坦桑尼亚这个被誉为全非洲最大的安博尼石灰岩洞穴。这洞穴是在1.5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形成的，它于1963年开放给游客入内参观。

在世界各地看过不计其数的石灰岩洞穴，全都被璀璨瑰丽的灯光装饰得花里胡哨；导游以刻板的声音把奇形怪状的岩石说成是大象、鲸鱼、老鹰，等等，地上走的、海里游的、天上飞的，全都有了，大家都随着导游既定的思维而发出录音式的啧啧惊叹。

然而，安博尼石灰岩洞穴不肯媚俗，它嫌胭脂污颜色，忠于本就地保持了原始的风味。

占地234平方公里，曲径幽深。一迈入洞穴，便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诡谲里；然而，导游把火把一亮起手电筒，我便不由得喊道：“啊！”

啊，惊悚！

千姿百态的岩石，宛若雕刻家鬼斧神工的杰作，抽象派与写实派的作品兼而有之，有的小巧秀气、有的磅礴大气，我仿佛走进了一家收藏珍奇岩石的博物馆，惊叹连连。导游不出声，任由我浮想联翩。

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有积水，湿漉漉的，我们举步维艰，然而，这恰好增添了寻幽探秘的奇趣。越起越高的，且行且看，看了两个小时，来到了洞穴深处的一个地方，那儿竖立着一个牌子：“游客止步”。原本以为地势崎岖，前行危险，然而，导游把火把一亮起手电筒，我便不由得喊道：“啊！”

短短几句话，却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当地人对于其他生物的尊重。

我们不喜欢蝙蝠随意飞进屋里干扰我们的生活，蝙蝠当然也不喜欢我们登堂入室扰乱它们的起居作息。

互相尊重，天下太平。

【横眉热对】掉书袋

大概在1980年年底吧，钱钟书到日本，做了一个著名的讲演，题目叫《诗可以怨》。

钱老洋洋洒洒，古今中外，引经据典，谈了一个由来已久的情感表达的问题，一字以概括之，“怨”也。他信口开河，东拉西扯，看似不经意，结尾处却慎重指出：“‘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

那个年代，年轻的大学生卢新华以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而启动了一场新的文学运动，其影响所及，各个艺术门类都卷入其中，包括美术在内。钱钟书以其聪颖明智，内心自然明白所出现的一切。不过，他仍然刻意保留其名士风范，拒绝所谓的“思想”包装，以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掉书袋”的方式，悄然加入到这场旨在催人泪下的情感表现主义加唯美浪漫主义的新时期艺术运动当中。

钱钟书“掉书袋”的功夫非寻常人可比，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也相当惊人。至少当年我翻阅四卷本的《管锥篇》时立马望洋兴叹。而且，我相信不少立志于文化工作的后进者们，也会产生如我一样的敬畏。反正，这一辈子再努力读书，肯定也掉不进如此浩瀚、涉及众多语言的“书袋”里头。

“诗可以怨”，古人深刻地了解这个浅显的道理，知道诗是“蚌病成珠”的产物，所以，如果没有真的痛苦，就不要“无病呻吟”。一旦有了痛苦而且真切，以情入诗，诗之感人也就自然如此如此这般了。说到底，一部文学史，说来说去，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理。

【不知不觉】汪曾祺家的打卤面

3月5日，是寂静的、沸腾的一天，朋友圈里读到各种纪念的文章。有关于汪曾祺先生的，他的百岁诞辰。

如果从书籍的出版来看，一个作家在人群中的冷暖的话，汪曾祺显然是热度较高的，有各种选本和全集。我在微信公众号里选了1991年第2期《收获》上汪曾祺的一篇自述文章《随遇而安》。那些年的《收获》上开辟了一个专栏“人生采访”，请大作家们“且说说我自己”，再请他们推荐一个人写印象记。于是有多篇就写了“且说说我自己”。而汪曾祺先生的，就是《随遇而安》，写他印象记的是韩蔚霞的《酒话》。

我是读了《受戒》才知道汪曾祺先生的。他晚年小说在《收获》上也刊发多篇，比如《小娘》。书架上也有很多汪曾祺先生的选本。读他的散文和小讲，看到讲述他人生的争议也略微看了一眼，往往是在散漫漫的状态，却忽然会怦然心动，那些感受不归纳，由此放置。也许下一次遭遇，不知是以何种方式。他

【横眉热对】掉书袋

大概在1980年年底吧，钱钟书到日本，做了一个著名的讲演，题目叫《诗可以怨》。

钱老洋洋洒洒，古今中外，引经据典，谈了一个由来已久的情感表达的问题，一字以概括之，“怨”也。他信口开河，东拉西扯，看似不经意，结尾处却慎重指出：“‘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

那个年代，年轻的大学生卢新华以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而启动了一场新的文学运动，其影响所及，各个艺术门类都卷入其中，包括美术在内。钱钟书以其聪颖明智，内心自然明白所出现的一切。不过，他仍然刻意保留其名士风范，拒绝所谓的“思想”包装，以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掉书袋”的方式，悄然加入到这场旨在催人泪下的情感表现主义加唯美浪漫主义的新时期艺术运动当中。

钱钟书“掉书袋”的功夫非寻常人可比，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也相当惊人。至少当年我翻阅四卷本的《管锥篇》时立马望洋兴叹。而且，我相信不少立志于文化工作的后进者们，也会产生如我一样的敬畏。反正，这一辈子再努力读书，肯定也掉不进如此浩瀚、涉及众多语言的“书袋”里头。

“诗可以怨”，古人深刻地了解这个浅显的道理，知道诗是“蚌病成珠”的产物，所以，如果没有真的痛苦，就不要“无病呻吟”。一旦有了痛苦而且真切，以情入诗，诗之感人也就自然如此如此这般了。说到底，一部文学史，说来说去，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理。



王谦熙 旅美华人作家

留住岭南的乡愁

“你祖上来自何方？”“你是什么辈分？”这两个小问题，在日常生活中，能准确回答的人可能不多，尤其是祖辈父辈离开故乡多年，在异地创业扎根，因种种原因，他们的后代，往往说不清楚自己的祖宗源流。显然，这跟乡土文化传承教育有关。当下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以古村落为载体的传统文化面临困境。

出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记住乡愁的朴素情怀，早在2008年，我就着手策划《岭南乡村文化记忆》系列丛书，尝试围绕乡村文化记忆，先是对具有古老历史的粤东乡村——我的故乡潮州沙溪镇21个自然村进行田野调查和史料搜集，通过挖掘整理村落历史，从人文背景、经济状况、教育、家族、民俗等方面详细挖掘、记录，以纪实文学的手法贯穿全书，图文并茂，可读性强、趣味性、故事性于一体，微观展现每一个村落的社会变迁轨迹。

2018年6月，大型公益乡土图书《走进潮州沙溪》作为“岭南乡村文化记忆”系列丛书的开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一面世即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欢迎，因它不完全是史志性读物，编写体例灵活，内容“白、富、美、软”，不单可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形象宣传的一张“文化名片”，同时还能够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铸魂聚力”作用，深度挖掘新乡贤、涵育文明新风等乡村文化内涵，在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在乡村经济及文学、社会学研究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2019年初，潮州湘桥区官塘镇编撰了《潮州官塘人文》，该书于今年2月公开出版。

为了乡村不失信，为了让后代记得住乡愁，我们将继续在广袤的乡间寻觅，挖掘岭南乡土文化的金子！

薪尽火传光不绝

享誉海内外，逐渐成为古代文学史论和古典戏曲研究名家。他从1948年开始执教于中山大学，直到1990年以84岁高龄退休。据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授黄天骥回忆，即使“退休”后，他依然坚持工作。清晨起来，就坐在书桌旁忙个不停。由于思想的开放和眼界的开阔，王季思先生的学术成就丰硕，尤为引人注目，其中就包括他借鉴西方文艺美学思想梳理归类中国古典戏曲而成的这两部名著。

王季思原来亦无悲剧喜剧概念。据易新农教授回忆，大概在1979年前后，有一次学术交流时，他告诉王先生：西方戏剧有悲剧喜剧之分，中国古典戏曲也可以分悲剧和喜剧。王先生很感兴趣。恰逢教育部委托中山大学举办全国高等院校戏曲培训班，由王季思先生主持，王先生于是热情邀请易新农前往该班讲学。培训班学员是各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讲师和副教授，其中南开大学的宋绵文毕业于中山大学，与易新农同班，易新农当时的职称仅是讲师。

易新农说，他的专题讲座分两部分：首先介绍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代表的西方悲剧喜剧理论，比如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借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净化)”，也有人认为希腊悲剧表述的是生命的尊严和意义。其次结合理论分析作家作品，重点介绍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代表作品，如《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美狄亚》等等。黄天骥当时是副教授，他在培训班上讲授关汉卿戏曲。易新农说，他们在培训班上的讲受到来自全国各地学员的广泛好评，特别是通过研讨古希腊悲剧，拓展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教学和研究思路。王季思先生亦受到启发，他主编十大悲剧和十大喜剧的念头正是在这次培训班中萌生的。

黄天骥教授说，王先生特别喜欢和年轻人接近，他觉得，教学相长，老专家也能从后辈身上吸取自己缺乏的东西。他还说，王季思先生有个习惯，“他写好文章后，总是长篇论文还是诗词杂感，总要复印出来，请自己的学生提意见”。王季思先生为十大悲剧和十大喜剧集分别作长篇前言，每篇洋洋万言，易新农教授说，王先生写完初稿后亲自送上门来求其修正，他也毫不客气地提出十八条修改意见，王先生虚怀若谷，一接受。王先生在十大悲剧集前言的结尾谦虚地写道：“运用悲剧、喜剧的美学概念论述我国古典戏曲，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们对欧洲悲剧、喜剧的理论既缺乏深入研究，对我国古典戏曲的艺术特征也探讨得不够。”然后他恳请专家和读者们指正。

作为晚辈同事，易新农与王季思先生谊兼师友，一直保持密切交往，除同学请益外也经常嘘寒问暖，关心先生的身体和生活。1990年春天，王先生偶患小恙，易新农教授前往探视，携去《歌德谈话录》一册，推荐先生一读。此后一段时间，王先生卧病在床，以翻阅《歌德谈话录》自遣，并深有感触。几天后他赋诗一首：“一榻度昏朝，浓情闲里消。群书求高阁，清梦越重宵。魏蜀何须羨，梁陈可避。殷勤谢歌德，知足自逍遥。”他将这首“卧病经旬以《歌德谈话录》自遣”的五言诗抄录于宣纸短笺上，赠“新农同志留念”。所谓“殷勤谢歌德”，除了感谢这本《歌德谈话录》陪他度过病榻上的寂寞时光外，可能还有感谢包括歌德在内的西方作家、思想家对他晚年学术研究启发的意思，也因此“知足自逍遥”。

谈起歌德和西方作家，易新农教授还想到英国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小说《盲人之国》，以及他与王季思先生1979年合写的《盲人之国》

品味 乡土叙事的乡野之美

对于许多文学创作者来说，“乡土”是一个极其特殊、充满情感的形象。和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迟子建的漠河北极村、苏童的香椿树街一样，江苏籍广东作家盛慧故乡乡兴的回忆性书写，也同样带有浓厚的地域风格。在其最新散文集《外婆家》中，作者生动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历史文化名城宜兴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不仅构建了富有特色的时代片段与历史记忆，也传递了作家的田园理想。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评价盛慧的散文：“真诚、舒展、优美，文字细腻，情怀广大。他的写作，正在努力拓展散文的疆域，并对汉语的沉静与绚烂有自己独特的体悟”。在《外婆家》中，盛慧笔下的故乡是一幅古朴素宁而又不失诗意的江南水乡图景。读其文字，仿佛来到江南乡间的绿野平畴，令人心旷神怡。(凤像一件往事)中描绘了江南午后闲适的田园风光：“乌鱼在细腻的淤泥里沉睡，躺在竹床上的人，用大蒲扇盖住了光斑。村口，硕大的老槐树下，一张散发着岁月光亮的八仙桌前，老人们正在打牌。地上，撒开了一地的烟蒂。卖茶水和凉粉的人，躺在逍遥椅上。收破破烂烂的溲尿佬，吹着一支笛子，从上一个村庄来。”在作家的笔下，故乡之美是各种声音气味的组合，萦绕在温婉清雅的意境中，田野、花香、竹床、月光、收音机、糯米酒、犁铧等丰富而具体的意象，共同营造了独特的乡野之美。

盛慧的作品中涵盖着丰富的江南文化色彩，从民俗风情到生态物产，从日常伦理到人情往来，都蕴含着深沉的思乡之情。正如出版家聂震宁所说：“盛慧的文字浸染着深情，字里行间弥漫着江南的水气与往日生活的痕迹，令人着迷，让人回味。”在《胃的回忆》《乡村的夜晚》《腊月的最后几天》《端午》等文中，盛慧详细描写了当地各种年节习俗，年三十的夜晚，端午节的粽子，等

留住岭南的乡愁

“你祖上来自何方？”“你是什么辈分？”这两个小问题，在日常生活中，能准确回答的人可能不多，尤其是祖辈父辈离开故乡多年，在异地创业扎根，因种种原因，他们的后代，往往说不清楚自己的祖宗源流。显然，这跟乡土文化传承教育有关。当下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以古村落为载体的传统文化面临困境。

出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记住乡愁的朴素情怀，早在2008年，我就着手策划《岭南乡村文化记忆》系列丛书，尝试围绕乡村文化记忆，先是对具有古老历史的粤东乡村——我的故乡潮州沙溪镇21个自然村进行田野调查和史料搜集，通过挖掘整理村落历史，从人文背景、经济状况、教育、家族、民俗等方面详细挖掘、记录，以纪实文学的手法贯穿全书，图文并茂，可读性强、趣味性、故事性于一体，微观展现每一个村落的社会变迁轨迹。

2018年6月，大型公益乡土图书《走进潮州沙溪》作为“岭南乡村文化记忆”系列丛书的开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一面世即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欢迎，因它不完全是史志性读物，编写体例灵活，内容“白、富、美、软”，不单可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形象宣传的一张“文化名片”，同时还能够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铸魂聚力”作用，深度挖掘新乡贤、涵育文明新风等乡村文化内涵，在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在乡村经济及文学、社会学研究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2019年初，潮州湘桥区官塘镇编撰了《潮州官塘人文》，该书于今年2月公开出版。

为了乡村不失信，为了让后代记得住乡愁，我们将继续在广袤的乡间寻觅，挖掘岭南乡土文化的金子！

薪尽火传光不绝

享誉海内外，逐渐成为古代文学史论和古典戏曲研究名家。他从1948年开始执教于中山大学，直到1990年以84岁高龄退休。据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授黄天骥回忆，即使“退休”后，他依然坚持工作。清晨起来，就坐在书桌旁忙个不停。由于思想的开放和眼界的开阔，王季思先生的学术成就丰硕，尤为引人注目，其中就包括他借鉴西方文艺美学思想梳理归类中国古典戏曲而成的这两部名著。

王季思原来亦无悲剧喜剧概念。据易新农教授回忆，大概在1979年前后，有一次学术交流时，他告诉王先生：西方戏剧有悲剧喜剧之分，中国古典戏曲也可以分悲剧和喜剧。王先生很感兴趣。恰逢教育部委托中山大学举办全国高等院校戏曲培训班，由王季思先生主持，王先生于是热情邀请易新农前往该班讲学。培训班学员是各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讲师和副教授，其中南开大学的宋绵文毕业于中山大学，与易新农同班，易新农当时的职称仅是讲师。

易新农说，他的专题讲座分两部分：首先介绍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代表的西方悲剧喜剧理论，比如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借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净化)”，也有人认为希腊悲剧表述的是生命的尊严和意义。其次结合理论分析作家作品，重点介绍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代表作品，如《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美狄亚》等等。黄天骥当时是副教授，他在培训班上讲授关汉卿戏曲。易新农说，他们在培训班上的讲受到来自全国各地学员的广泛好评，特别是通过研讨古希腊悲剧，拓展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教学和研究思路。王季思先生亦受到启发，他主编十大悲剧和十大喜剧的念头正是在这次培训班中萌生的。

黄天骥教授说，王先生特别喜欢和年轻人接近，他觉得，教学相长，老专家也能从后辈身上吸取自己缺乏的东西。他还说，王季思先生有个习惯，“他写好文章后，总是长篇论文还是诗词杂感，总要复印出来，请自己的学生提意见”。王季思先生为十大悲剧和十大喜剧集分别作长篇前言，每篇洋洋万言，易新农教授说，王先生写完初稿后亲自送上门来求其修正，他也毫不客气地提出十八条修改意见，王先生虚怀若谷，一接受。王先生在十大悲剧集前言的结尾谦虚地写道：“运用悲剧、喜剧的美学概念论述我国古典戏曲，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们对欧洲悲剧、喜剧的理论既缺乏深入研究，对我国古典戏曲的艺术特征也探讨得不够。”然后他恳请专家和读者们指正。

作为晚辈同事，易新农与王季思先生谊兼师友，一直保持密切交往，除同学请益外也经常嘘寒问暖，关心先生的身体和生活。1990年春天，王先生偶患小恙，易新农教授前往探视，携去《歌德谈话录》一册，推荐先生一读。此后一段时间，王先生卧病在床，以翻阅《歌德谈话录》自遣，并深有感触。几天后他赋诗一首：“一榻度昏朝，浓情闲里消。群书求高阁，清梦越重宵。魏蜀何须羨，梁陈可避。殷勤谢歌德，知足自逍遥。”他将这首“卧病经旬以《歌德谈话录》自遣”的五言诗抄录于宣纸短笺上，赠“新农同志留念”。所谓“殷勤谢歌德”，除了感谢这本《歌德谈话录》陪他度过病榻上的寂寞时光外，可能还有感谢包括歌德在内的西方作家、思想家对他晚年学术研究启发的意思，也因此“知足自逍遥”。

谈起歌德和西方作家，易新农教授还想到英国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小说《盲人之国》，以及他与王季思先生1979年合写的《盲人之国》



马林霄



王谦熙



王谦熙



王谦熙



王谦熙



王谦熙



王谦熙



王谦熙